



程中,针对高层管理者的违法行为进行维权取证是困难的事情,且陈磊人在境外,该案件的程序将更为复杂。

“高级管理人员熟悉企业内部的运作机制,又掌握相应的权力,违法行为极具迷惑性和隐蔽性,且有较高的反侦查意识。比如,使用‘抽屉协议’、使用亲信人员掌握要害岗位或代持皮包公司、不留书面代持协议等证据、提前对好说辞、幕后遥控,将不当套取资金行为用表面合法的合同和交易形式伪装。另一方面,如果嫌疑人外逃,将使案件的调查难度更大,串供、毁灭证据更为容易,执法部门的调查能力也会受限。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表示。

事实上,核心业务环节的权力寻租,因手法的隐秘性已成为相关案件取证的一大难点。

“小官巨贪”频发

互联网企业高管手握资源调配、战略决策的核心权力,其贪腐行为不仅会直接造成企业巨额资产流失,更会破坏公司治理体系,挫伤员工与投资者信心。

而从行业整体来看,互联网企业的腐败风险早已突破传统领域,呈现出与行业特性深度绑定的新特征,且从高管层向中层、基层蔓延,从核心业务向配套环节渗透。

2025年5月,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联合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《互联

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》显示,2020年至2024年,在其审理的127件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中,涉业务部门贪腐案件共104件,占比81.89%。从人员身份来看,被告人年龄呈现中青年化、职级中层化特点。年龄在18岁至45岁的被告人185人,占比91.13%。此外,存在“小官巨贪”现象,127件案件中,基层普通职员贪腐犯罪金额共计5567万余元,个案平均犯罪金额达126万余元。

记者注意到,有的案件中,行为人系网络平台安全运营岗普通职员,利用能够解除平台账户封禁的职务便利,帮助他人解封账号并收取“好处费”;有的案件中,行为人系互联网公司商务专员,利用管理品牌运营的职务便利,为相关网店增设“满减活动”争取补贴,提升网店的平台交易额,并收受他人给予的钱款。

此外,外包环节的利益输送问题,也是互联网企业反腐打击的重点。例如,2026年1月23日,腾讯发布《腾讯集团反舞弊通报》,90余人因触犯“腾讯高压线”被解聘,其中,20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,30余名涉案的外部人员也被公安机关一并抓捕。

据记者粗略统计,在腾讯通报的19起案件中,提及“为外部人员/公司谋取利益,收取外部人员/公司好处

费”的有10起。

反腐思路转变

面对日益复杂的腐败态势,互联网企业的反腐思路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,从“讳疾忌医”的内部消化,转向“零容忍”的司法介入与常态化治理。

在企业反腐的相关案例中,商业贿赂、职务侵占成为互联网公司打击舞弊贪腐行为的重点,多家头部企业已建立常态化反腐通报与制度化治理。如阿里巴巴的廉政合规部、百度的职业道德建设部、京东的监察部、腾讯的反舞弊调查部等,专门负责调查和处理内部贪腐问题,并会定期公开通报公司触犯“高压线”的名单以及永不合作企业名单,通过公开透明以及从严问责的方式,提升企业治理效率。

互联网企业的反腐也不止是企业内部的事,在内部查处相关行为后,企业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涉案人员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例如,去年12月,在字节跳动披露的2025年三季度内部违规案例的处理情况中,三季度共有120名员工因触犯公司红线被辞退,14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司法机关也在积极查办互联网商业腐败案件。比如,北京市检察机关开展打击治理互联网企业商业腐败犯罪专项工作,通过技术辅助审查、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等手段破解取证难题,同时,制发检察建议,引导企业完善廉洁风险防控体系。

无论是迅雷起诉前高管,还是互联网大厂的常态化反腐通报,这些反腐实践,勾勒出互联网行业反腐的新趋势:互联网企业既要通过常态化的内部监督、制度化的流程管控,从源头压缩腐败空间;更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,推动反腐工作法治化,让贪腐行为无处遁形。

编辑/李程(lcpupu@126.com)